

• 城市研究丛书 •

重庆城市研究

隗瀛涛 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重 庆 城 市 研 究

隗瀛涛 主编

四川 大学 出版 社
1989 年 · 成都

责任编辑：陈建明
封面设计：冯先洁

重庆城市研究

魏瀛涛 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4.25 印张 350 千字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198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5614-0242-2/C·13 定价：5.95 元

前 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金融、信息中心，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城市成了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地，对现代化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大量人口和社会活动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高度集中，也给人类带来了各种祸害和弊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城市问题困扰着人们，这促使人们去进一步了解、认识城市这个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有机体。一些学者在对城市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感到不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很难准确地把握和认识当前的城市问题，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本世纪 20—30 年代，一门以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演变为目的的学科——城市史学首先在欧美诞生了。

我国曾是世界历史上城市最发达的国家。城市之多，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数量之大，城市经济和城市文化之发达，在世界中古史上无可比拟。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有城镇 800 — 900 个，其中齐国的临淄城就有 7 万余户、30 余万人。西汉时期，长安、洛阳、成都等六大都市人口都在 10 万人以上，长安城规模最大，仅城墙的周长就有 25 公里多，这在当时是举世无匹的。唐代中国的城镇约 1000 余个，其中洛阳、长安、扬州、成都等八大都市总人口达 350 余万，全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10% 左右。相比之下，同期西方城市的发展就缓慢得多。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是欧洲城镇发展的一个兴盛时期，有大小城镇 3000 个，但规模都很小，其中 2800 个仅有人口 100—1000 人，其余城镇的人口也不太多。中世纪西方最大的城市威尼斯在

1363 年时仅有人口 7.8 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很低，直到 1800 年时才达到 3%。^①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使我国学者对城市史研究一直较为重视。也许是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太兴盛了，近代以来的学者对城市史的研究大都偏重于古代城市，而对古代城市向近现代城市发展演变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城市史研究虽然代代有人，但却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标志是没有形成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没有产生城市史研究的群体和学派，因而长期处于依附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状况。这种状况限制了城市史研究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城市的中心作用较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突出，建设现代化的城市成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关键。建国以来，由于小生产者意识和极左思想的影响，我们对城市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城市的性质、城市的作用都缺乏科学的认识，因而对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长期处于半自发的、半盲目的、远非科学化的状态。经过十年文革动乱之后，无论是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城市的管理者，无论是专家教授，还是普通的科研人员，都开始痛定思痛，深刻反省。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指示要对城市进行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推动了城市研究的发展，城市史研究也被国家提上了议事日程。1986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将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列入“七五”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课题，并确定首批研究的城市为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并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给予四个城市史研究课题组提供资助。1987

^①以上参见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世界人口地理》。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领导小组委托我为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课题组主要负责人。在中共四川省委的关怀下，得到四川大学，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重庆地方史资料组等单位及部分在重庆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管理城市经验的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建立了包括7位四川大学教授、副教授、讲师和3位重庆社科界同志的“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课题组”，开始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

重庆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山城，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巴国，其时，巴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江州即是现在重庆所在地。明朝以前，重庆城的规模不大，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清以后，随着川江航运的开拓，重庆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商业城市和转运中心。19世纪末，重庆开埠后，城市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迈出了近代化的步伐。国内外贸易的兴盛，近代川江航运和陆路交通的迅速发展，使重庆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高。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因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而迅速发展，一跃成为战时国统区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工业、金融、交通的中心和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遐迩闻名。解放以后，重庆城市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发达，商业繁荣，人才荟萃，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4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四川学术界尤其是重庆学术界的同仁为研究重庆的历史作了大量的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撰写了相当多的论著。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以来，全国各地发表和出版的有关重庆地方通史和专门史，包括重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艺术以及人物传记等各方面的论文、资料约4000余篇，专著150余本，可谓成绩卓著，硕果累累。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论著多数还不能列入城市史研究的范畴，但是，它们却为近代重庆城市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课题组的同志经过两年的努

力，完成了该课题第一阶段的研究任务，并将主要的成果编成了这本奉献给读者的论集——《重庆城市研究》。

《重庆城市研究》由 10 篇论文组成，每篇论文既可独立成篇，相互间又具有有机的联系，从而构成了我们对重庆城市史研究的基本框架。这 10 篇论文在课题组统一安排下，以不同的论题，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重庆的“城市化”和“近代化”问题。城市化和近代化是研究近代城市史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离开了这方面的研究，或者不在这方面下工夫，近代城市史研究将会失去主要的目标和意义。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有机体，因此城市史研究不能用一种理论和方法，而应注意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资料相结合。《重庆城市研究》的作者们，试图运用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教育学、大众传播学、行政管理学、文化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重庆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

《重庆城市研究》一书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的阶段成果，虽也注意到了各篇论文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因是阶段性成果的汇集，所以，在理论、方法、观点、写作风格等各方面都不强求一律，允许各抒己见，各展笔锋，以利活跃思路，鼓励创新。

1989 年，是重庆得名 800 周年，建市 60 周年，解放 40 周年，我们谨以此书作为献给重庆“三庆”的一份薄礼。在此，我们向支持、帮助“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的各位领导、各界朋友表示深切的感谢。本书得以问世，承蒙四川大学出版社夏木俊同志大力支持，在此，也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恳请读者对本书的缺点、错误给予批评指正。

魏瀛涛

1989 年 4 月于四川大学

目 录

前言	(1)
试论重庆的城市化和近代化	隗瀛涛(1)
唐宋巴渝地区的经济发展	胡道修(42)
两宋时期的重庆	胡昭曦 张茂泽(72)
重庆近代工业发展述略	凌耀伦(101)
近代重庆经济中心的初步形成	周 勇(138)
近代重庆企业家的商品意识与城市近代化	谢 放(172)
重庆新教育的兴起与城市近代化	何一民(218)
重庆的新闻业与城市的近代化	蒋晓丽(282)
清代重庆城市人口与社会组织	王 笛(310)
重庆城市基层行政管理	陈建明(379)

试论重庆的城市化和近代化

隗瀛涛

重庆是我国著名的山城。它既不濒临浩瀚的海洋，又非地处广袤的平原，而是深居内陆，三山两水，冬雾夏热，山峻坡陡。但是，它曾以巨大的魅力，用“看不见的手”，招来了大量人口，扩大了自己的身躯，成了古代长江上游的区域性军事政治中心和重要的商业和货物集散中心。到了近代，重庆又在西南率先迈出了近代化的步伐，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中心城市，对四川，乃至西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重庆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发展过程，即由城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和城市的近代化过程。通过这两个过程，重庆的城市功能日臻强大，城市文明日益发达，城市发生转型变化，城市的作用与地位日形重要。前天和昨天的发展，为今天的重庆铺奠了基石，也留下了遗传基因。研究重庆的历史发展过程，对我们认识重庆的经济战略地位，进一步建设和发挥其中心城市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因商而兴，由城堡到城市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①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它是三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社会生产力

^①《列宁全集》第19卷，第264页。

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城市产生的经济基础。“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①重庆城市化的动力正在于此。它是一个因商而兴的城市。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的华蓥山南麓，地当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口，“左挟右带，控驭便捷”，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周朝时为巴国国都。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设巴郡，郡治在江州县（今重庆市）。由于防卫的需要，张仪在此筑城，作为秦王朝统治川东地区的军事、政治据点。汉代，“江州城固而粮多”，除驻军外，城内住官僚、地主，有然、杨等冠族，世为大官。三国蜀汉时期，江州仍为巴郡治所，都护李严屯军于此，筑大城，周围十六里。隋、唐、宋时期称渝州。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改渝州为恭州。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光宗即皇帝位，据当时制度升“潜藩”恭州为府，名重庆，距今整八百年矣。

在古代的一个长时期内，重庆及附近地区，由于自然条件较成都平原为差。“盛夏无水，土气毒热，如炉碳燔灼。山水皆有瘴而水气尤毒”，^②其经济发展落后于川西平原和川北嘉陵江中游地区。“土地硗确，事力贫瘠”，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文化上也是“不学少儒”，“尚鬼不药”。自隋唐迄北宋为朝廷贬谪流放罪犯之地。重庆因地势险要，作为一个高垒深墙的军事城堡和区域统治中心度过了它漫长的岁月，工商业并不发达，城的功能主要在军事镇慑和政治统治方面。朝天门城门上书“古渝雄关”，太平门城门上书“拥卫蜀东”，通远门城门上书“克壮千秋”等字样，都表示了古重庆城的性质。

经过隋唐时期汉人与少数民族人民的共同开发，到宋代因生产力有了发展，重庆才开始了由有城垣的城向人口密集，商业繁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1页。

^②范成大：《吴船录》卷下。

荣的城市渐进。在宋代，重庆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进步。农作物以水稻、小麦、粟的种植较为普遍，经济作物以荔枝、茶叶著名。手工业方面，合川的造船业，涪州的盐业，重庆的酿酒业均较发达，纺织品有葛布、麻布、绢等，烧制瓷器成了这一地区一项重要的家庭手工业。

重庆拥有总汇长江上游诸干流支流的水利，川省及滇、黔各地的货物皆仰此转口贩卖。在宋代，重庆的这一优势，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发挥，成为了商业贸易中心。“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几。”^①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商税收入的记载。商税在宋代已成国家的主要收入之一。巴渝地区的渝、合、昌三州和南平军，熙宁十年（1077年）总税额为91900余贯，超过了当时全国商税额较高的杭州（82000余贯）。据《元丰九域志》的记载统计：渝州三县有城镇23个，昌州三县有镇38个，合州五县有镇45个，广安军三县有镇29个，巴渝地区，共有市镇135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重庆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形。

人口数量是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渝州人口有了明显增加。宋太宗年间（976—997年）渝州有19942户，元丰三年（1080年）增到41080户，崇宁元年（1102年）又增到42080户，百余年间人口增加一倍以上。这表明，在宋代重庆城的功能由以军事政治功能为主开始向包括商业功能在内的多种功能发展了。宋代是我国城市的发展时期，那时的重庆虽还没有象成都那样是载诸史册的著名城市，但重庆的城市化过程确已由此开始了。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中前期更是重庆城市化的重要阶段。在明代，重庆地区已成为四川粮食产区之一。田粮征额数，成都

^①《宋代蜀人文集存》卷78，冉木：《心舟亭记》。

府 31 州县计 157729 余石，重庆府 20 州县及 5 土司计 344497 余石，超过成都府一倍以上。其时，重庆有城门十七，九开八闭，城内有 8 坊，城外有 2 厢。^① 在全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三十几个城市名单中重庆已是榜上提名，成了我国的一个著名城市了^②。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四川的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口大量减少。顺治十八年（1661 年）四川全省人籍者仅 16090 户。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仍只有 18090 余户^③。土地荒芜，社会残破。重庆乃征战之地，所受破坏更加严重，“民靡有遗”。清朝在四川建立统治地位后，为了恢复四川经济，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移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无地或少地农民大量入川垦荒，使四川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大幅度增产，经济作物如棉花、蚕丝、苧麻、烟草、柑桔、甘蔗、竹木等产量增加，井盐、制茶、制糖、矿冶、陶瓷业皆有发展，商品经济逐渐活跃起来。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重庆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

当时，重庆—汉口—苏州的长江航线，是米、木、盐、棉、布、洋广杂货的交流主干。这条主干道上的商品流通，具有长距离运销，全国性流通的性质。川江（即长江宜宾到宜昌段）的航运主要是在清代因经济发展的需要开拓的。长江上游的商运以水路为主体，长途贩运往往以河流为依托，与沿江河城市串连，形成了以重庆为枢纽的商业贸易网络。川江主要支流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都是粮、棉、糖、盐产区，汇流而下，集中重庆再转运汉口。重庆是长江东西贸易主干道的起点，又是长江上游商品集散中心，从而大大增强了商品吞吐量的城市的经济吸引力和

①乾隆《巴县志》卷2。

②见傅崇兰著：《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第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参见《四川简史》第18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辐射能力。并通过长江交流主干道与全国范围的流通网络连结了起来。

清代四川产米居全国各省之冠。“各省米谷，唯四川所出最多，湖广、江西次之。”^①由于清初川省人少地多，粮食有大量剩余，成了我国商品粮的基地。清帝又鼓励粮食由商贩流通，准许长途贩运。据嘉庆《四川通志》载，雍正至嘉庆年的11次官运出川的米粮即达787万石，商运出川者在外。四川米皆集中重庆水运，经夔关到汉口落脚，再转运到苏州枫桥，再由各地商人运销浙江、上海、福建等地。在清代中前期四川米和湖南米的东下是当时的最大宗贸易。估计川省每年沿江东下的商品米粮大约有150万石左右。重庆是四川运粮船“换船总运之所”^②，周围的津渡成为“米口”者甚多。嘉陵江的碳坝渡等16处津渡，成“米口”的有9处。长江的溉澜溪等9处津渡全为“米口”^③。重庆是川米出口的大码头。

清嘉庆以后，四川沱江流域逐渐成为新兴的产糖区，由内江发展到资阳、资中、简阳等县。糖并不是人民每天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半奢侈品。糖的生产从来就具有商品性质，而且价钱高体积小适于运销。四川的糖，除省内销售外，主要是沿长江经重庆、万县转口到湖北宜昌、沙市、汉口等地。

据乾隆《巴县志》记：“渝州……三江总汇，水陆冲衢，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迁。”^④由于这种“万里贸迁”的发展，造成重庆城“九门舟集如

①《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三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②乾隆《巴县志》卷3。

③乾隆《巴县志》卷2。

④乾隆《巴县志》卷3。

蚁”，转口贸易一派繁荣的景象。

转口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促进了重庆城市商业的兴旺。重庆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发达的贸易，吸引了大量商业性移民。乾隆时期，重庆府城的商帮已有 25 个，各业牙行达 150 家^①。广东、浙江、福建、江西、两湖、山西、陕西等省的商贾经常往来。康熙中后期，重庆城内已有 29 坊，城外已有 21 厢^②。乾隆时城内已有街巷 240 条。城市的规模比明代大有扩展。官衙、公廨、庙宇、官僚地主住宅等作为古代的城的主体的唯我独尊局面已被打破，商业性用房在沿江一带已是栉次鳞比。“酒肆楼舍与市廛铺坊，鳞次绣错，攘攘者肩摩接踵。”^③在城市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人口密度也在增加。重庆府的人口数，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是 56 万人，嘉庆十七年（1812 年）是 234 万人^④。从嘉庆十七年到宣统二年（1910 年）的 98 年间，成都府人口仅增加 8%，而重庆府人口增加近 200%。重庆地区土地面积有 3 万多平方公里，嘉庆中期，每平方公里平均 77 人，略高于四川全省平均人口密度，但到清末即达到每平方公里平均 229 人，大大高于四川全省人口平均密度。（全省每平方公里平均 154 人）。当然，上列人口数包括着重庆附属的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数字。这个数字要大于重庆城市本身的人口数。但这并不妨害我们看出，在清代，由于重庆城市的繁荣而带来的重庆地区（包括重庆城市）人口增长和密集的趋势。城市是靠人的聚集而形成的。重庆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密集是城市化不可缺少的因素和标志之一。

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重庆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商业人口

①民国《巴县志》卷4上。

②乾隆《巴县志》卷3。

③乾隆《巴县志》卷2。

④参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5食货志4。

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据《巴县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重庆定远厢共300户，其中从事工商业的有208户，占总数的69.3%。同治《巴县志》载：嘉庆十八年（1813年），重庆紫金坊、灵壁坊共534户，其中从事商业的有362户，占总数的67.8%^①。这两个数字说明，到了清代中期，重庆的商业人口比重至少在某些街区已超过了官僚、地主、军队、僧尼等人口的比重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已显得相当突出。据道光四年（1824年）《巴县保甲烟户男女花名册》：重庆城市人口有17750户，65286人。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重庆已是一个人口较多且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方向发展的聚集点，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性城市了。

重庆自古就是川东的军事政治中心。清初，四川总督曾一度移驻于此，仍称重庆府，建重庆镇，置总兵署，又设分巡川东道署。同时，也是四川东部的文化教育中心。在清代，重庆的传统教育是比较发达的。明、清两代重庆府和巴县各立孔庙，称为学宫、近庙立学，设学官主持。乾隆以后，学宫疏于治理，失去了教育职能。教育任务转由书院承担。明代，重庆有凝道、朱凤二书院，毁于明末战火。清代重庆的书院发展较快。清初设缙云书院，乾隆三年（1738年）又设渝州书院。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渝州书院更名为东川书院。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设字水书院。到十九世纪末，重庆城先后建有书院19所。这些书院，为传授儒学，准备科举考试服务^②。此外，重庆城还有不少私塾，承担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重庆城市的文化教育职能日益显露。

重庆自宋代开始的城市化过程，经历了近九个世纪的漫长岁

^①同治《巴县志》卷2。

^②参见民国《巴县志》卷7。

月，直到清朝终于成了我国的一座著名城市，基本上走完了自己的城市化过程。当我们考察这一过程时可以发现，重庆城市化的推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庆城市的发展与长江上游的经济整体发展是分不开的。宋、清两代是古代重庆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两个时期正是长江上游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活跃的时期。这种经济背景，给重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有了大量商品需要发展长距离贩运的客观要求，使重庆的地位日显重要。源源不断的米、糖、盐及其他农副产品在重庆集散，造成了重庆转输繁忙，商业繁荣，人口密集，城市功能增强。因此，重庆城市的发展一开始就是以长江上游整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为依托的。长江中下游是重庆通往全国市场的主要渠道，是重庆的主要购销市场和信息来源地。重庆的城市化与整条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缺少了与长江中下游的频繁交流，重庆是难以城市化的。因此，重庆只有依托上游，面向下游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在长江这条商品流通干道上的上游枢纽优势。

就城市类型而言，古代的重庆是一个商业城市。从地理上形成的水运优势是四川各地所不能比拟的。古代重庆是因水运而商盛，商盛而城市兴的。因此，充分地开发和利用长江、嘉陵江的水运，发挥自己转口贸易的优势，站住长江连接上游“天府之国”，中游“鱼米之乡”，下游“金三角”的枢纽位置，仍是今日建设重庆所必须重视的问题。

在重庆城市化过程中，外省移民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如果说，宋代重庆的开发是汉人与僚人等少数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清代重庆城市化的实现则主要是各省移民的功劳。重庆“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一空，外来者什九皆湖广人。”^①“吴楚闽粤

^①民国《巴县志》卷10。

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①外省人仅“大江拉把手者”，“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②清代重庆“求一二宋元旧族盖亦寥寥。”^③据《巴县档案》，嘉庆时期的重庆的109个商行几乎全是外省人开的。清朝初年，大量移民来到重庆，使旧有的封建宗法关系和土著保守封闭思想有了削弱，商业意识有了加强。各省移民在重庆设有会馆（如潮广馆、福建馆、广东馆、山西馆等）保护本籍商人之利，既是同乡组织又是同业组织。外省移民从各自的家乡带来了劳力、资金和经营管理经验和与各省的自然联系，为重庆的城市化做出了贡献。重庆这种五方杂处的人口结构，使重庆人有较多的开放意识和进取精神。这是特定的历史条件赋予重庆的一个特色。

重庆城市因商而兴是历史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④重庆的城市化既表示了一个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也为今后重庆城市的近代化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重庆城市化开始的时间，与西欧城市建立的时间差不多，但城市化的道路是中国式而不是欧洲式的。欧洲的城市主要是十世纪以后，由商人、手工业者和逃亡农奴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建立的。领主依靠土地权力要求统治城市 and 提供税赋。城市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则握有货币权力，形成市民阶级，通过赎买乃至武装对抗，取得城市自治。这种自治城市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利的。重庆象其他中国城市一样，原是一个封建政治和军事中心。封建专制统治者在这里有强大的统治力量。在这里尽管有货

①乾隆《巴县志》卷2。

②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

③同治《巴县志》卷1。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67页。